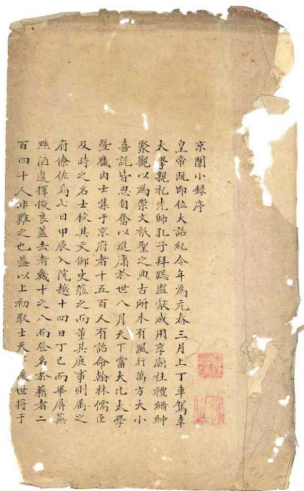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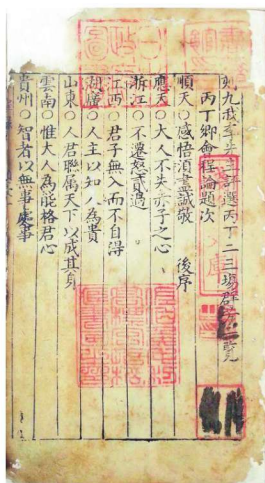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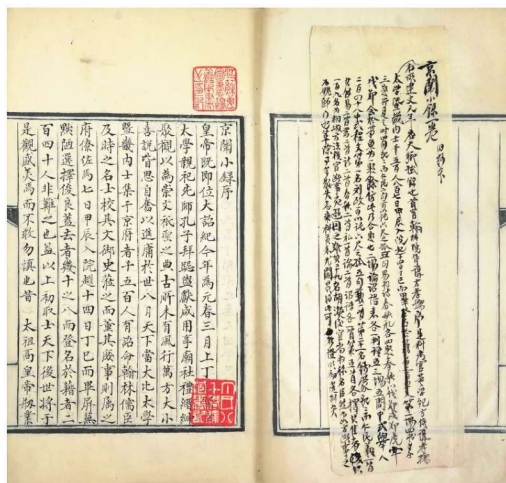
《新刻湖洲註釋弄丸判語評林》
書影，萬曆間書林萃慶堂刻本，
日本山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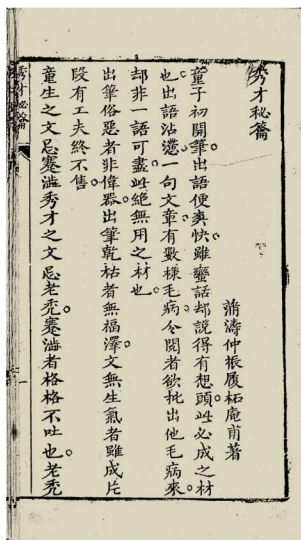
《建文元年京闈小錄》書影，清
抄本，朱緒曾藏，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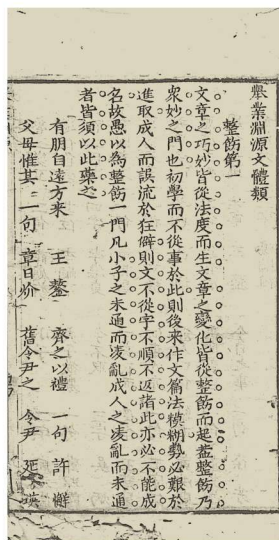
《刻九我李先生評選丙丁
二三場群芳一覽》書影，萬
曆間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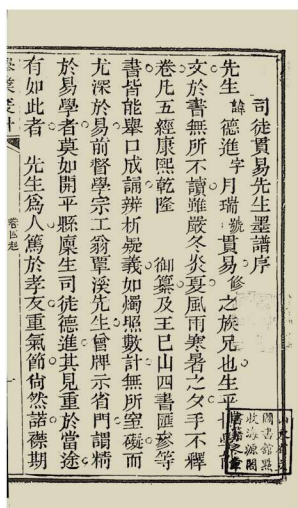
《京闈小錄》書影，清抄本，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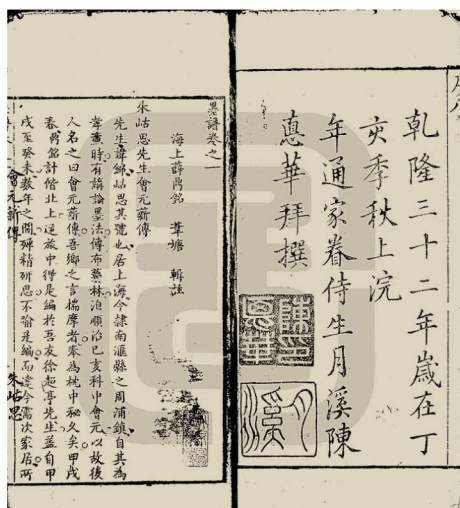
《秀才秘笈》書影，嘉慶二十五年刻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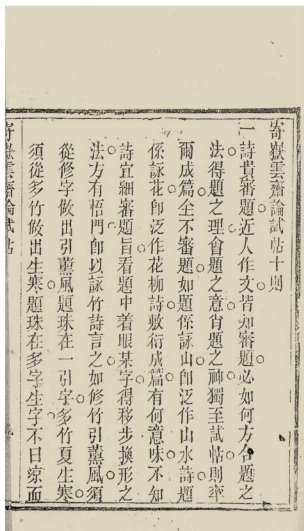
《舉業淵源》書影，雍正九年愛蓮堂《明文分類小題貫新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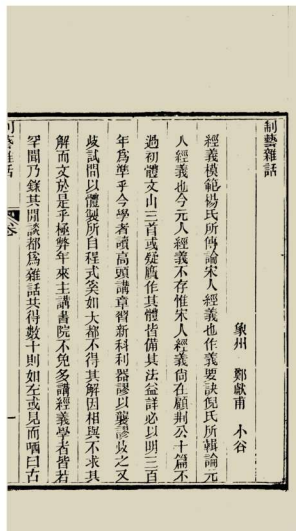
《舉業度針》書影，道光二年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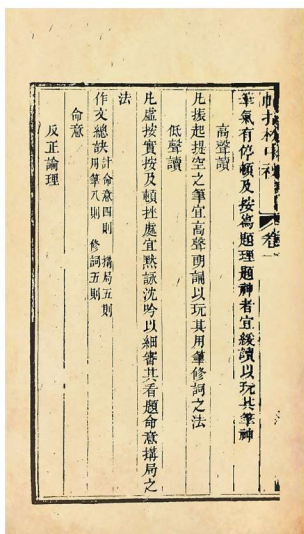
《墨譜》書影，乾隆三十二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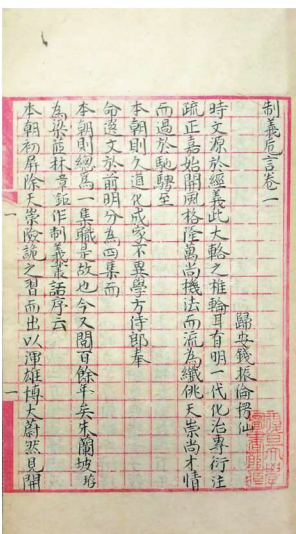
《分體利試試帖法程》書影，咸豐九年通德堂刻本



《制藝雜話》書影，咸豐五年刻本，貴州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帖括枕中祕》書影，光緒二十二年刻本，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制義厄言》書影，清抄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本書獲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清代稀見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資助，項目批准號：17JZD047

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元明清程墨評點與文論的關係研究」資助，項目批准號：15BZW103

前言

一

科舉時代主流文化的主體是一批科舉人物。所謂科舉人物，是指通過科舉的選拔方式進入（或試圖進入）仕官階層從而成為政府各級機構的管理人員。

明清時期，朝廷對人才的選拔方式主要是科舉和薦舉。明初，朱元璋特重薦舉，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科舉雖行，匪深所願，因而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迨後科舉漸重，科獨重甲，薦舉曠時一舉，於是科舉成為明清人才選拔的最主要途徑。《明史·選舉志》曰：「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由學校到銓選，既是朝廷選拔人才的途徑，也是明清文人普遍的人生歷

程。其中又以科舉為關鍵環節，學校為科舉培養人才，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則經由銓選進入官僚體系，科舉過程中的師生關係、同年乃至同房、同號關係也被帶入官僚體系。同時，進入官僚體系之後，一些官員被任命為各府、州、縣之學政，主持一方之教育與考試，或被任命為鄉、會試之考官，不僅由此而建立了新一輪的師生關係，而且其經學思想、社會觀念乃至文章、文學觀念也經此而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科舉文化構成了明清時期社會人文的一個獨特層面，是認識主流文化和主流社會的一條極其重要的途徑。

構成明清文人之人生主軸的即是其科舉人生，故學界有「科舉人物」之一說。明清文人的讀書、應試、任官，既是一個人才選拔、使用的過程，也是文人實現其人生價值的過程。文人的政治思想、社會觀念、哲學、宗教觀念等在這個過程中呈現。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建立事功，致用於天下。同時，文人又是文章寫作和詩文創作的主體，其科舉人生中的種種際遇，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不管是與世推移，還是獨立物表，其覽物之情，發而為文，這就是明清文人的文章世界、文學世界。可以說，科舉文化是明清文人的人生底色，是其各種觀念的起點或參照。了解科舉文化，是

我們認識明清文化與文人的重要途徑。

二十世紀以來，科舉學研究的發展有一條清晰的軌跡：從三十年代章中如、傅增湘、方瑜、鄧嗣禹、陳東原、盧前諸先生，到五十年代的商衍鎰先生、八十年代的程千帆先生、傅璇琮先生、王德昭先生，其研究成果有探究制度史，有追溯考試史，有從制度文化的層面透視文學。九十年代鄧雲鄉先生、啓功先生的八股文啓蒙專著出版，使八股文體從科舉諸文體中凸顯出來，此後便有田啓霖、龔篤清、孔慶茂諸先生的八股文集整理、八股文史和批評史研究，臺灣「中研院」蕭啟慶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高華先生對元代的科舉制度的研究，楊學爲先生關於中國考試通史的研究，張希清先生、毛佩琦先生關於中國科舉制度史的研究，李世愉先生關於清代科舉志的研究，劉海峰先生關於科舉學建構的研究，陳文新先生主持的科舉通志研究，吳承學先生及其團隊的科舉各文體研究等，都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最爲重要的科舉學研究成果。海外方面，美國的艾爾曼先生、日本的鶴成久章先生都在科舉研究方面有令人矚目的成果。至今，科舉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對這一領域的歷史學研究、教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都已全面展開。

隨着研究的深入，科舉文獻的搜集和整理成爲一個迫切的問題。已有數代學者致力於這一領域，首先是考試錄文獻的影印出版。臺灣學生書局於一九六九年出版《明代登科錄彙編》。中國大陸方面，由龔延明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歷代登科總錄》於二〇〇三年啓動，其中，《宋代登科總錄》十六冊已正式出版，《清代登科總錄》的編校正在進行中。自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七年《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由寧波出版社出版，包括《登科錄》（二〇〇六年）、《會試錄》（二〇〇七年）、《鄉試錄》（二〇〇一年）。此後有龔延明、祖慧撰編的《宋登科記考》（二〇〇九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所編《中國科舉錄彙編》（二〇一〇年）及《續編》（二〇一一年）。龔延明先生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二〇一六年）。

除考試錄、登科錄之外，還有楊家駱先生的《中國選舉史料》（一九七七年）、秦國經等主編的《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一九九七年）、李世愉先生主編的《中國考試文獻集成》（二〇〇三年）、文清閣編的《歷代科舉文獻集成》（二〇〇六年）、來新夏先生主編的《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彙編》（二〇〇六年）、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的《清代縉紳錄集成》（二〇〇八年）、陳文新先生主編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

研究叢刊》(二〇〇九年)、王鴻鵬先生編輯的《臺灣科舉史料彙編》(二〇一六年)等,都為科舉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研究文獻。

程墨文獻的整理或影印方面,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顧廷龍先生主編的《清代硃卷集成》(一九九二年)。之後有田啟霖的《八股文觀止》(一九九四年),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的《中國古代闡墨卷彙編》(二〇一〇年),顏建華選編《清代湖南朱卷選編》(二〇一二年),龔篤清主編的《八股文彙編》(二〇一四年),林祖藻主編的《明清科考墨卷集》(二〇一五年),田啟霖編著的《明清會元狀元科舉文墨集注》(二〇一六年)。

科舉文論方面,王水照先生的《歷代文話》(二〇〇七年)、陳文新先生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二〇〇九年)已經選入了一些科舉文選和文論。在稀見文獻的整理方面,陳廣宏、龔宗傑先生編校的《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二〇一六年)收錄了十二種科舉文論。這些文獻蒐集、整理工作大大地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但是,由於文獻的缺失,目前學界對明清科舉史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環節的認識尚不够清晰。比如明清歷科的考試錄、登科錄,儘管有顧廷龍、龔延明等先生的成果,但洪武、永樂間的鄉試錄、萬曆丙午、丁未的鄉、會試錄、乾隆三十六年順天鄉試題名錄等

文獻仍亟待進一步搜索。儘管有梁章鉅《制義叢話》的點校出版，但我們對清代制義文論的發展軌跡的認識仍然是粗線條的、跳躍式的。明清時期一些在當時頗具影響的科舉文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今天已成稀見之物。科舉文集方面，目前學界主要關注的是八股文選集、八股文論和狀元策。但是，無論是從對科舉制度的了解，還是對科舉文體類型的了解，都不能局限於八股文和狀元策。五經文、詔、誥、論、表、判、策、試帖詩等文體和四書文一起，構成了科舉文體的系統。明代曾出現過大量的關於二三場的程墨選集和文話。崇禎刻本《學府秘寶》就提到當時「京省所移過二三場，十有餘種」。但是到了清代中葉以後，這類書籍大量失傳。這與中、晚明二三場程墨的具體內容有關。據乾隆三十七年上諭，乾隆帝令各省加意購訪「古今來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一〕}但特意加上一條限制：「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騫，編刻酬倡詩文，瑣碎無當者；均毋庸採取……」^{〔二〕}在禁刻「青詞」時說：「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三〕}而其中的「二三場」的專書更因其在政治上語涉「違礙」而列入禁毀名單。這些二三場的專書雖經乾隆朝的禁毀，依然

有一些書留存下來，如袁黃的《群書備考》、署名爲焦竑、王衡同選的《二三場藝府群玉》^{〔四〕}、陳錫爵輯《明館課》、茅維選《策衡》、周延儒輯、賀逢聖注的《學府秘寶》。呂五音、夏履先選評的《舉業瑤函》。但更多的二三場書籍，像周鍾編《後場紀年》、蔣方馨選《二三場鴻寶》和《二三場開律》、朱天璧選《二三場論表式典》和《論表式典》、王宇輯《策約前後集》、黎利賓編次《二三場有神集策》、《二三場有神集表判》、趙燦英評《二三場開宗表策》、馮夢禎選《後場旁訓評林》、徐日久著《論文別集》、《二三場類纂捷要》、馬晉允選《二三場典錄》、《後場名山業》、項聲國輯《後場雋永》、楊彝與顧夢麟選《後場備考彙典》、楊廷樞《後場經濟類編》、周立勳《後場持雅錄》、袁黃《表式表括表渥言》、佚名的《二三場玉函時務考》、《策類典》、《策式典》等，今天已不見其蹤，如果不是已葬身於乾隆朝那場禁毀烈火之中，那麼民間或域外或有幸存之可能。

蒐集、整理稀見科舉文獻的任務已迫在眉睫，但任務仍然艱巨。在各圖書館的收藏中，科舉文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文獻並沒有被登錄，各圖書館所收藏的科舉文獻有一些並沒有在其書目數據庫中體現出來；一部分稀見科舉文獻則存在於民間收藏之中；域外各圖書館所收藏的稀見科舉文獻更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將這些稀見

文獻篩選、整理出版，需要學界同仁共同的努力。

另一方面，科舉文獻又是浩如煙海，優劣並存。雖然很多文獻到今天已成稀見之物，甚至成了孤本，但稀見之物與文獻價值之間並不能劃等號。一些文獻儘管是稀見，但在明清時期因書商出於漁利目的而粗製濫造或大同小異，一些鈔本也只是應試士子或鄉村塾師之淺識陋見，這就需要我們對稀見科舉文獻進行甄別、評估、論證。另外，來自歷史學、教育學、文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在從事這一工作時各有所側重。我們的蒐集、整理工作可以分階段、分類型進行。本叢書選擇明清時期為時間坐標，選擇考試錄、二三場文選和科舉各體文論為校點整理對象。

二

本書選入稀見的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從時間的跨度看，所選文獻的編撰時間從明代建文元年到清代光緒年間，大體涵蓋明清時期。從內容分類來看，明代選取四種，清代選取十一種。其中多為僅見之本，如《弄丸判語》、《群芳一覽》、《舉業瑤函》、《一隅集》、《吳蘇亭論文百法》、《能文要法》、《秀才秘籀》、《制義厄言》、《帖括枕中秘》。其餘

六種則為稀見之本。

四種明代文獻既具史料價值，也具有「文選」的特點。《建文元年京闈小錄》是建文元年應天鄉試錄，除了卷首無考官、同考名姓仕履和主考官之序文外，其他均遵考試錄體例。此書也可視為一部三場文選。無論是對於了解明初的宮廷政治，對於認識明初科舉考試科目類型變化、考試錄形式變化，還是對於了解明代科舉文體（包括八股文體）的演變，都有着重要的意義。南京圖書館藏本丁丙的跋語強調了此書的史料價值：「革除事多散失，志乘、科貢表尤闕略。得此可攷證明初遺制矣。」

關於此科《四書》義的試題，沈德符曾指出：「建文元年己卯，應天鄉試，首題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節。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衡文者有意責備方、黃諸公耶？抑偶出無心耶？即云無心，與時事暗合，亦不祥甚矣。」其時朱棣之兵已漸動，建文帝剛過弱冠，雖不能稱「六尺」幼君，但可視為「孤君」。故此科試題或者為主考官之別有用心。此科鄉試第一名的劉政，其文被取為《小錄》之程文。據《革朝遺忠錄》，後來太宗登極，方孝孺被戮，劉政悲忿不食死。朱彝尊《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記劉龍光之遠祖「（劉）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

先生」^{〔五〕}，正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據鶴成久章教授所引，明末周鍾所撰《皇明歷科程墨文》（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六〕}）將劉政之文的作者署為方孝孺。明初似未有考官代撰程文之舉，此或為此書編者以晚明的通例去臆想明初所致。

李廷機選評的《群芳一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關於萬曆丙午鄉試錄、丁未會試錄、《明代登科錄彙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中國科舉錄彙編》等書均未收錄。除《河南鄉試錄》、《浙江鄉試錄》以外，萬曆丙午、丁未的考試錄均未見其蹤。《群芳一覽》選取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鄉試、三十五年丁未會試的二三場程文，同時也選入萬曆丙午順天、浙江、山東、河南、廣西等省鄉試錄的前序或後序，選入萬曆丁未會試錄的前、後序，實是萬曆丙丁鄉會考試錄之選集。這些考試錄的序文所表現出來的考官思想既反映考官對萬曆朝的憂慮與謀劃，也影響了一代學子。這些考官如楊道賓與黃汝良（丁未會試正、副主考官）、吳道南與孫如游（丙午順天鄉試正、副主考官）、張邦紀與吳忻（應天鄉試正、副主考官）、彭遵古與張汝霖（山東鄉試正、副主考官）、卞成憲與吳亮（河南鄉試正、副主考官）、王舜鼎與張鶴騰（廣西鄉試正、副主考官）等的科舉觀、人才觀在序文中都表現出來了，他們對經史傳統和當下時務的思考與關切，也蘊含在其

所出的論、表、策的題目和所作程文中。

編者李廷機，萬曆三十五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繫閣籍六年，秉正止九月。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明史》稱：「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求罷乞休，萬曆帝屢詔勉留，乃屏居荒廟。至萬曆四十年，疏已百二十餘上。而事實上，「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所斷決。士大夫意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七〕}於是他陞辭出都待命。對於萬曆朝的朝綱，李廷機尤有切膚之感與憂慮。《群芳一覽》是他對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各省鄉試錄和三十五年（丁未）會試錄之前、後序及程文墨卷的選編。這是一部鄉、會試第二、第三場之程文墨卷之合集。部分程文出自各省鄉試和會試主考官。如丙午江西鄉試程文《士風吏治》一策即見於主考官曹於汴的《仰節堂集》。這些程文正可以見出各省試官所呈示的「文體之儀的」。該書由三部分構成：論、表、策。論、表部分各選鄉試程文十篇、會試程文一篇。策部分選各省鄉試程文共三十六篇，會試程文五篇。可見李廷機對策文之特別重視，其所選策問與策對，體現出他對萬曆朝的朝綱的特別關注。

明清的鄉、會試的第三場和殿試均試策。策問的出題可以包括「君道、臣道、事功、用人、理財、人品、士風、書史、兵政、時務等題」^{〔八〕}。從歷史價值看，鄉、會試的第三場和殿試的策試提供了各個歷史時段的「時務」。朝廷出於解決現實時務難題而設計策問，並要求考生直陳己見，不必顧忌。李衷純甚至從經世致用的角度，把策視為明代可以垂不朽的一代之文。他說：「昭代若兼三季（指元代若兼有漢、唐、宋三代的特點——引者），然明經而至舉子業，不過府儒糟粕，小兒啜飮。語、詔、誥、表，雖沿詞賦之遺，無當實際，皆朝取青紫，夕覆醬醅矣，烏足垂世？惟是制策，所問有不自黼扆宮壺以迨人才禮樂、邊陲河渠、錢谷刑獄三事之所平章、六曹之所職掌者乎？射策所對，有不淹古貫今、導利規害、識若觀火、畫若破的以箴主德、贊國政、襄民瘼者乎？即非世務而譚理學子史，有不剖一人獨見、抉千古疑奧、為木天石渠之秘解乎？故攬一策而一朝時事可稽也，攬群策而累朝故實可考也。蓋視漢策尤鴻鉅，與金匱所藏正相表裏。不朽之文，要惟此耳。豈明經、詞賦可仿佛乎！」^{〔九〕}尤其是出自考官的策程文，其意義非同一般。茅維的《皇明策衡》所選為王守仁、徐階、高拱、申時行、王世貞、張居正、許國、李維楨、李廷機、馮錡、沈一貫等考官所撰程文。對此，馮夢禎說：「其程士之篇出於